

“了解过去,开创未来”——由周有光先生写给《中华读书报》的一封信说起

从永安路106号出发



祝晓风

标题这八个字加了引号,因为这是不久前周有光先生写给我的几个字,我今天借用过来,作为这篇短文的标题。

事情要从16年前说起。1998年3月25日,是星期三,《中华读书报》出报的日子,阳光明媚。中午,在永安路的《光明日报》食堂,我们刚好好坐下,总编辑梁刚建一脸愁容,微微皱眉,叹了口气说:“唉!今天的好稿子有点儿太多了!”——我们大家当时听了,都笑了。这是梁老师惯有的幽默。这不是做作出来的,他是真觉得那天的报纸好稿有点“淤”,怕一次集中用完了,下期没什么好稿了。有这么夸张吗?

1998年3月30日,我和赵晋华收到周有光先生寄来的一封信,现摘录如下:

晓风同志、晋华同志:

收到1998年3月25日《中华读书报》,读了其中“蒋麟麟谈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和“一篇书评问世的前后”这两篇报道,非常高兴,使我对我《中华读书报》肃然起敬!

……

《历史研究》(1998.1)刊登葛剑雄、曹树基评杨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认为这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敢于如此诚恳地提出批评,不论语气是否有多多少多少过于激动之处,是难能可贵的。这实际不是对一本书的批评,而是对一种学术风气的批评。这是从学术禁锢走向学术解放的号角,这一声号角划破了万马齐喑的学术长空。

为了振兴中华,必须认识历史的真实,必须恢复学术的真谛。否则中国将长期继续停留在第三世界。

专致敬礼!

周有光
1998年03月27日
时年93岁

收到信的当天,我就回了信。

七年虎坊桥



赵武平

从1994年初秋,到2001年仲夏,差不多7年时间,每到星期三,我都会去一趟虎坊桥,——永安路邻接虎坊路的丁字路口东南角上,那栋老式米黄色大楼五层朝南的一个大房间,就是读书报编辑部的所在,而那里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更是我曾经的一个住处。

在去年出的一本随笔集里,我说在北京,自己住过三个地方:北大勺园、南礼士路建筑设计院和小关楼花园。实际上,还应当把虎坊桥也算上,因为当年在报社赶稿子,不止一次奋笔通宵,待到拂晓收工,困得实在睁不开眼了,就索性睡在办公室门后的简易床上,——那算是老斋的“地盘”,偶尔他回海淀办事了,就成了我的临时借宿之地。可以说,在报纸初办的头一两年,大多数光棍汉(除了老魏和小呼,似乎其他小伙子没谁不是独来独往的),是以报社为家的,工作、生活和娱乐,都以报社为中心;至少有两个小哥儿们,从恋爱到成家,拉手的都是负责排版和校对的美女同事。

我喜欢虎坊桥,不光因为在那里工作开心,更是因为买旧书方便,和吃东西便利。直到现在,我还很想念,出大门往东不远的天桥附近的茶汤、烧饼和羊蝎子,许多在报社消磨的周末,常常跑过去解决午饭。有时候,还来一碗卤煮过过瘾,桌边摊上一本刚到

随后,周先生又于4月8日、4月23日和5月29日三次给我写信,真诚相邀,让我去他家谈。没想到,此约一订订十六年,甲午春鸿始信然。今年我再去看老先生时,109岁的他已经几乎记不得我了。时光悠悠,不禁让人唏嘘感慨不已。——这中间的故事,容另文再叙。但当年《中华读书报》影响之大,由周先生这封信,就可见一斑。《中华读书报》可以说是当年中国文化界最明亮的新闻窗口,学术界最高端的交流平台,出版界最灵敏的风向标和读书人最温暖的精神家园。像周有光先生这样的精冲神爽。像周有光先生这样的精神,为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每个版面,都发表许多好稿、大稿,每个编辑,都有不止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为自己此生能在《中华读书报》效力,与这么多杰出的人共事,感到无比光荣。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成就了《中华读书报》如此辉煌呢?

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光明日报》孕育、培养了《中华读书报》这份儿子报,这也可以算作为地利,也可以说是“出身”和“家世”。没有光明日报各个方面有形无形的支持,为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中华读书报》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是《光明日报》深厚的学术传统,独特的文化基因,使《中华读书报》与生俱来就有着清新高雅的文化品格,和丰富而有内涵的学术品位。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风云际会,《中华读书报》占了天时。她可以说说是应运而生。

从1992年开始,国家转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同时伴随着新的思想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出版界也迎来一个“黄金十年”。当然,那也是互联网在2000年前后从天而降之前,报业最后的一个黄金时期。从90年代开始,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全局性的话题,比如,有“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二王(王蒙、王彬彬)之争”,还有“重写文学史”,学术规范大讨论,等等等等。这些都使《中华读书报》敏锐地捕捉到,并且给予了充分地展开。还有,一些当时轰动一时的文化界头号大案,也往往都是由《中华读书报》最先独家披露,比如:“吴作人向侵权宣战”,“关于克隆羊的报道”,“王戎揭露陈明远假冒郭沫若之名”,“阎涛诉权延丞侵权案”,“油画《开国大典》著作权之争始末”,“孙敬修爷爷讲出的一串官司”,等等,这

些报道迅速而深入,客观而公正,在读者中赢得了很大声誉。还有一些学界公案,如:孙闻兴披露张汝伦抄袭,“孟子变成门修斯”,等等,都非常尖锐。所以,在文化学术界,出版界和新闻界这三者之间,《中华读书报》起到了一种独特的连结、沟通和聚合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华读书报》不仅垄断了学术界、出版界的新闻话题,而且不断地组织策划、创造了许多话题。经过几年的积累,《中华读书报》自然在同类报纸中独占鳌头。

第三,当然就是刚建带领一群爱书、爱文化的年轻人,大家团结奋斗的成果。作为读书报的家长,刚建当然有着博大的胸襟,高远的眼光,极高的新闻素养和非凡的管理才能。这些对他都不在话下。我想说的是,他对这份报纸最大的意义,是他重视人、尊重人、欣赏人,清楚每一个人的价值,然后信任你,关心你,培养扶持你。聚合人、协调人。那一年,《中华读书报》将由每期四个版扩至每期八个版。他为了劝说我来讲书报,对我讲要委我重任,说:“你来了之后,就编后四版的第一版”。——头版?！那多重要啊!其实就是第五版。现在当段子讲,大家听着都笑,可当时他是很严肃的。他是真觉得这个重要,而不是换个说法哄你。他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读书报的价值。有个业务骨干是外省青年,春节时回家买到火车票,他就敢出钱让人家坐飞机往返。一年冬天的早上,我要陪家人到北师大办事,他知道了,居然就专门派了车来送。他尤其重视青年人,培养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热情。大家都说刚建举重若轻,抓大放小。其实抓大放小对他只是一般化的形容,他其实能做到抓大放“大”,因为他对你是从内心的尊重与信任。他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领导,但更是老师和兄长,对更年轻一辈来说,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生气的大叔。他心大心宽心善,其心如莲。

在众多为报纸作出巨大贡献,对我本人也给予很多帮助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王小琪。刚建称她为《中华读书报》的“定海神针”:“她是领导层中唯一贯穿20年的人。小琪为人宽厚,虑事周全,在工作、生活上对包括我在内的同事关怀备至。她不仅是一个好领导,也是大家的好大姐。她自己的文章也是清新脱俗,别人无

法模仿。魏琦也是《中华读书报》为数很少的几个“50后”之一。因为他过于低调,过于勤恳,所以不了解他的人,会以为他仅仅就是勤恳而已。其实不然。他80年代就给唐■先生做过助手,不仅学识高,而且文字功夫了得,很长时间,他是《中华读书报》文字方面的总把关。当年,他曾把我的一个采访的平庸标题,顺手一改,变成“既要用得对,还要用得巧”,此文于是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从1994年,他每个周二晚上,在所有工序完成之后,都要到印刷厂去核对胶片,是每次出报回家最晚的人。放眼20年来中国报刊出版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

我们当然也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无数人的热情支持。其中有一个,我必须提一句,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南开的前辈张小鼎。《中华读书报》创刊之初那两年,我关于现代文学、鲁迅研究方面的报道,几乎都是张先生提供的线索,或者至少和他有关。他是《茅盾全集》的责编,但一辈子淡泊名利。他还为我们报纸写过好几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包括“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西行漫记》的流传”等等,影响很大。

侯艺兵也是单位不在《中华读书报》,但给我们作了巨大贡献的。没有侯艺兵的《中华读书报》,我认为是不可能想象的。1996年10月,鲁迅逝世60周年,侯艺兵就受我委托,专门到天津采访李季野,因为李先生是60年前参加鲁迅葬礼,而当时仍健在的很少的几个人之一。后来,他为《中华读书报》采访人物,拍摄了大量照片。他与《中华读书报》的关系如此之密切,以至于许多学界中人和读者都误以为他的单位就在《中华读书报》。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这么多人鼎力相助,这份报纸想不火都难。这就是读书报真正的、甚至唯一的成功秘诀,人和。

的确,了解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同时,开创未来,也必须了解过去,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读书报》这几年又迎来新的机遇,越办越好。《中华读书报》由当年蹒跚而行的婴儿,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由一棵小苗,已经长成一棵大树,而且硕果累累。他聚合创造了无数的因缘善果,也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了解过去,真实不虚;开创未来,光明照家园。我衷心祝福《中华读书报》!

刚建在报社是老大哥,也是我读书和编书的榜样。他和《书稿》杂志主编李春林,原来都是《光明日报》的评论员,杂文写作名气甚响,文集出过好几部,他们也还合作编过不少好书。受他们启发,我也先后编了一些丛书和文集:“读译文丛”、“译者视界丛书”和《王尔德全集》。

说起读书、写书和编书,可以说是读书报同仁的共同爱好,——萧夏林、呼延华和祝晓风,还有以前在人大出版社编过汪曾祺、金克木和张中行等图书的小琪老师,他们中的哪一个,不是编书好手呢?

也不意外,毕竟谈到读书报,人们会说,它是爱读者的家园。而因为这个家园,我也会想起两个小伙伴:刘江华和田俊。江华是广西高考状元,北大考古专业高材生,他一来报社就做我的助手,一起编辑“世界书林”副刊。后来成为《北京青年报》的得力干将。而个头不高而天赋甚高的田俊,家乡远在湘西,学画画出身,我编“世界图书”专刊,版式都是他做的。同他闲聊说起沈从文,一口湖南腔的他总是很激动,文化前辈在他身上潜移默化地影响,是望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工作也很努力,据说我离开后,他不仅和报社同事恋爱结婚,还还成了北京另外一份重要报纸的主力美编。前两年去多伦,在草原上骑马的时候,晓风兄和我谈起田俊,面容上仍然荡漾着赞赏的神情。

一晃20年了,说起虎坊桥,我思念的,仍是昔日的小伙伴,和大家朝夕相处的青葱岁月。

这是我进入《中华读书报》实习时的社址。出生的时空会成为一种基因,影响未来的发展脉络,对人如此,对报纸同样如此。

很快,我和余敬中写出了第一篇消息,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骑车送到报社。我们坐在梁老师的对面,忐忑不安地阅读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快,他大笔一挥删掉了最后一段,说“记者不要发议论”,把稿子交给了一本编辑王菲编发。我和余敬中的“处女作”就这样诞生了。

这篇消息的发表使我们正式成为“书记”(报道图书出版的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心中隐隐涌动的新闻理想变得现实了一点。梁老师的编辑功力常常引得我和敬中心生仰慕。一篇《央视推出〈读书时间〉》的稿件,他将“推”字改为“挤”字,瞬间点化传神。而编辑部所挖掘、策划和报道的文化界重大事件,不仅让文化读书界在争鸣中繁荣,也使读书报一点一滴地积聚起独特的报道品质和影响力。

在永安路106号这间编辑部里,我收获到的远远不止新闻业务技能。1998年初,作家柯云路推出了《发现黄帝内经》,声称自己发现了“当代华佗”、神医胡万林。这激活了无数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的生存梦想,他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聚向胡万林,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从科学、理性、质疑的角度,完成了《柯云路到底发现了什么》的深度报道,成稿预备发表在祝晓风老师主编的“■望”版上,但最终因为题材敏感未能刊发。梁老师当即卸下联系,稿件最终刊发在《新闻出版社》上。当初的报纸和采访纪录如今已经微微泛黄,时间业已证实了这篇报道的价值。而梁老师对稿件的良苦用心则一直常存我心。

其实,梁老师对于每一个像我这样的实习生亦师亦友亦父。报社细心地安排好吃饭、打车、通讯等采访后勤支持,让实习生心生归属、与报共荣。读书报的文化完全没有普通新闻机构的那种科层和身份隔膜,或者本应有,但在读书报的编辑部中已无从感触。

读书报的编辑部文化使永安路106号成为实习生们共同的加油站,众多普通大学生的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励志大戏:余敬中加盟央视有了更专业的拓展,余海波成为《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如今我也成为一名教师,我把对梁老师和读书报的感恩化作对学生的关心和培养,这就是所谓的“薪火相传”吧。

世纪之交,互联网掀起一波热潮,众多“书记”下海成为时髦、高薪的网站编辑。这波热潮也吹进了永安路106号。梁老师希望《中华读书报》在互联网上也能一纸风行,2000年,中华读书网破壳而出。

5年前,梁老师个人的魄力、远见和自掏腰包的5000元使读书报出版大业得以完成,5年后读书网的建网大业同样离不开他的魄力和远见。而此时,梁老师所能调动的资源已经远远不止5000元了。在中华读书网的筹办、运营期间,梁老师展现了与资本和市场对接的能力,同投资方通过多轮谈判磋商,达成文化共识、寻找商业模式。这个过程,是文化与商业的对接,文化与市场的对接,文化与技术的对接。从这个意义上



翁昌寿

这是读书报的诞生地,也是我进入《中华读书报》实习时的社址。出生的时空会成为一种基因,影响未来的发展脉络,对人如此,对报纸同样如此。

第一次走进永安路106号是1997年,我和同学余敬中骑车从中国人民大学出发,花了近一个小时。我们的“介绍人”是在报社实习过的师兄余海波。印象中,读书报的编辑部像极了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场景。不同的是,主编梁刚建老师陪着满头大汗的我们慢慢聊天,丝毫不吝惜他的时间和精力。要不是梁老师的温厚亲切所营造的编辑部文化氛围,骑车一个小时的距离肯定扼杀掉我们与读书报的缘分。

很快,我和余敬中写出了第一篇消息,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骑车送到报社。我们坐在梁老师的对面,忐忑不安地阅读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快,他大笔一挥删掉了最后一段,说“记者不要发议论”,把稿子交给了一本编辑王菲编发。我和余敬中的“处女作”就这样诞生了。

这篇消息的发表使我们正式成为“书记”(报道图书出版的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心中隐隐涌动的新闻理想变得现实了一点。梁老师的编辑功力常常引得我和敬心生仰慕。一篇《央视推出〈读书时间〉》的稿件,他将“推”字改为“挤”字,瞬间点化传神。而编辑部所挖掘、策划和报道的文化界重大事件,不仅让文化读书界在争鸣中繁荣,也使读书报一点一滴地积聚起独特的报道品质和影响力。

在永安路106号这间编辑部里,我收获到的远远不止新闻业务技能。1998年初,作家柯云路推出了《发现黄帝内经》,声称自己发现了“当代华佗”、神医胡万林。这激活了无数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的生存梦想,他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聚向胡万林,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从科学、理性、质疑的角度,完成了《柯云路到底发现了什么》的深度报道,成稿预备发表在祝晓风老师主编的“■望”版上,但最终因为题材敏感未能刊发。梁老师当即卸下联系,稿件最终刊发在《新闻出版社》上。当初的报纸和采访纪录如今已经微微泛黄,时间业已证实了这篇报道的价值。而梁老师对稿件的良苦用心则一直常存我心。

其实,梁老师对于每一个像我这样的实习生亦师亦友亦父。报社细心地安排好吃饭、打车、通讯等采访后勤支持,让实习生心生归属、与报共荣。读书报的文化完全没有普通新闻机构的那种科层和身份隔膜,或者本应有,但在读书报的编辑部中已无从感触。

读书报的编辑部文化使永安路106号成为实习生们共同的加油站,众多普通大学生的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励志大戏:余敬中加盟央视有了更专业的拓展,余海波成为《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如今我也成为一名教师,我把对梁老师和读书报的感恩化作对学生的关心和培养,这就是所谓的“薪火相传”吧。

世纪之交,互联网掀起一波热潮,众多“书记”下海成为时髦、高薪的网站编辑。这波热潮也吹进了永安路106号。梁老师希望《中华读书报》在互联网上也能一纸风行,2000年,中华读书网破壳而出。

5年前,梁老师个人的魄力、远见和自掏腰包的5000元使读书报出版大业得以完成,5年后读书网的建网大业同样离不开他的魄力和远见。而此时,梁老师所能调动的资源已经远远不止5000元了。在中华读书网的筹办、运营期间,梁老师展现了与资本和市场对接的能力,同投资方通过多轮谈判磋商,达成文化共识、寻找商业模式。这个过程,是文化与商业的对接,文化与市场的对接,文化与技术的对接。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梁老师和读书报可以称得上文化产业的试水先锋。

中华读书报的办公地点不在永安路106号报社内,最初是在西三环的一个饭店。梁老师派出去读书报的副总编陈晓梅、读书报兼职学术顾问杨玉圣教授和我等读书报人员参加读书报的建设,连当时的投资方都惊叹“怎么一夜之间就组成了这么齐整的团队”。这个团队把读书报的文化基因源源不断地注入了读书报。

中华读书网诞生不久,2000年4月,文化读书界发生了“长江·读书奖”风波。该奖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声称全盘拷贝诺贝尔奖评审程序,立志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然而,《读书》杂志兼职执行主编汪晖却获此奖,引发学界哗然。杨玉圣教授牵头策划了“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约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讨论,每天在读书网平台上发表一篇学者讨论文章。一时间,读书网成为了解读风波动向的首要论坛,学术评价的程序正义如此“高大上”的话题成为网络热点。全部讨论文章后来集结为《学术权力与民主》一书,由鹭江出版社出版。

源自读书报的文化自觉使新生的读书网一鸣惊人,获得了新文化事件中的话语权和可信度。而读书网的种种尝试和创新也丰富拓展了读书报的业态和服务维度。

读书网尝试网络新书发布会,既具备传统发布会的仪式感和新闻感,又比传统发布会传播效果要好。当年红极一时的畅销书《富爸爸 穷爸爸》都在读书网上发布过广告。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一大批文化读书类网站都没能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博库、旗帜席殊、人民时空等红极一时的文化网站相继倒下。读书网也经历了投资方的几度变化,在转战长安街上的首都时代广场、上地、亚运村等地后,终告休眠。办网站所需要的理念和思维已经不再是传统办报的模式,互联网的文化传播也许需要独特基因,而当时留给报业办网和创新的政策空间和资本准备都不充分,投资方也无力为未来回报并不清晰的读书网提供持久支持。作为先驱者的荣耀和风险是对等的。

在读书报20年发展史上,读书网是短暂的一页,它没有成功,但也并不能就此断言失败。在互联网上铸造文化品牌和文化责任,让读书报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入口之一,这样的理念只会随着读书网经验教训的日益明朗而更加坚定。

20年来,读书报所服务面向的文化界、出版界、读者经历着痛苦而剧烈的变迁。众多媒体的文化类书报版已经纷纷被娱乐版攻陷,明星的八卦绯闻淹没了文化的争鸣和传承,“书记”正被狗仔队取代,甚至央视也无法无视网收视率的压力保全一档《读书时间》。正是这样的背景,凸显出读书报顽强存在和不断发展的文化自信。

如今,文化出版领域更发生着质变:我文化时极为敏感的书店与二渠道、网店,出版社与书商的“国民”竞争话题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上市、股价和正在涌入出版业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苹果、亚马逊、中国移动等巨头正成为行业的主导。当资本和技术轮番挤压使产业成为文化的最热词时,文化反而成为资本的口红。

从永安路106号出发,从读书报到读书网,资本和技术的诱惑并没有让读书报丧失掉自己的文化内核。它坚守思想文化学术家园,努力发出文化的声音。在一切都正在变化、一切又都如此不确定的今天,读书报的文化姿态因此变得独特而优雅。

作为曾经的实习生和员工,我感恩读书报给我的历练和机会;作为文化学者,我更感谢读书报通过20年来纯粹不变的坚守,使之成为耸立在永安路106号 and 众多文化读书界人士心中的文化地标。